



第二次现代化

*Dialectique*

在我看来，要在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之间作出区分，关键在于那些僵死的范畴已僵死到了极点，另外，相应地还出现了僵死的机制。

对全球化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同关于民族国家“集装箱”的看法相互补充的理解，另一种是取代这种看法的理解。只要人们确定 民族国家仍在占主导地位 全球化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一种补充性的视角……

我对第二次现代化的诊断是 民族国家‘集装箱’会自行解体 获得另外一种性质 使得我们形成有关跨国性的流通、生活方式、交流关系的新观念 使得在各民族国家、各地区、各组织内部 即在社会的所有层面上 在经济领域、劳动领域、社会网络、政治组织内产生出各种机制。

威尔姆斯(以下简称“威”)请您允许我们在开场时谈谈社会学的意义与用处。谈谈这样一个问题:社会学的任务是什么?

贝克(以下简称“贝”)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社会学是描述社会分析的。但随之问题就有所转移了:“社会”是什么?它是什么意思?人们是无法嗅到、看到、触到和尝到社会的。

威:请原谅,可是人们毕竟要到摩肩接踵的大街上去,要到足球场或小酒馆去,会印象鲜明地感触到社会。

贝:是的,可“摩肩接踵”恰恰不是社会学称之为“社会”的那种东西。一个待在安安静静的家中读书的人,也属于社会的范畴。也许这个人出身于所谓的有教养阶层,攻读过浪漫派这一专业;要么就是不得不写一篇书评,以便糊口。社会学当作社会来分析的东西,总会被社会自我呈现出来的方式所扭曲。社会学处理的不是僵死的素材——就像化学家所做的那样,不是可顺顺当当地塞进“试管里,加以科学性解释的东西。社会是由工会、政党、穷人和富人等等组成的。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社会成员分别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来澄清与辩解自己的地位。他们或实质上已经有所领会,或无论如何都做得自己仿佛已经有所领会一般。与此相反,社会学要形成自身对“社会”的理解。无论“社会”是什么,首先要在社会学的概念框架中得到理解。相对于常识来说,这一框架常常显得很抽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是不可被

直接感知的，它同社会成员的自我解释是相抵触的。

同时，社会仿佛模糊不定的庞然大物一般无处不在，对许许多多的事情负有责任。如果有人偷了东西，人们问起此事时，就常常会听到说，不该由窃贼对自己负责，而该由社会对他负责，是社会把他变成了窃贼。涉及社会学的是活灵活现的外行社会学家，这些外行社会学家多多少少都是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就是在这些外行社会学家的影响之下对社会进行研究的。所有这些使得社会学如此地混乱不堪，像着了魔一般，并常常令人格外恼火，也使得社会学是如此有趣和激动人心。

威 我们可否作出一个略带论战性的论断 即社会学把自身理解为政治决策者的辅助性科学？

贝 想必许多社会学家不是这样看的。实际上 即使个别社会学家持反对意见 社会学同国家、政治权威的联系也是既定的。值得注意的还有，社会学分析的不是一般社会 而是各种社会。所以 我们碰到的只能是一个德国社会、一个法国社会、一个美国社会、一个伊朗社会、一个日本社会等等。这就是说 有多少民族国家 就有多少社会。在社会学通常的理解中，各个社会都是依民族国家而组织起来的。国家充当了社会的缔造者、监控者、庇护者。各个社会都被设想为承受者，它们是在国家的势力范围内产生并延续的。这种看法将社会同民族国家等量齐观 认为社会在地域上是有限的 它深深地切入了社会学的认识、社会学的概念、社会学的视角。可以说 它切

入了社会学的想象。民族国家成了社会学的感知背景。由此，人们才可能谈到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这一重要假设意味着：人类在一段有限的时间里分裂为各个民族，各个民族都在培养与经历自身的统一性文化，这种文化维系着民族国家。将这些挪移到社会学中来就意味着：社会学的着眼点是民族国家。正是对各个社会的民族国家式的考察方式带来了这种着眼点。

威：这对于社会学的研究有何意义？

贝 方法论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得以应用之际 它的重要性完全是未经质疑的。由国家来规整和限定的社会领域被设想为这样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对社会进行社会学诊断所必需的各种重要过程和条件都会反映出来 或得以发现。社会学家们总在分析他们的社会 尽可能地将他们所处的社会同其他社会进行比较，随后由此推论出社会之一般。迪尔凯姆是这样做的，他目睹法国的状况 基于“是什么在维系现代各个社会”这样一个问题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即某种“有机的团结”是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 冯克斯·韦伯也是这样 他在谈到官僚主义与目的合理性时，考虑的主要是世纪之交时的普鲁士管理机构。

威：人们从自己那个社会的经验中阐发出一些概念，随后将这些概念套用到有着不同历史进程和形态的各个

社会上，这样做在方法上难道不是很成问题的吗？

贝 实际上 这是某种西方式的概念至上论 它总是受到强调 又总是受到批评 它在方法论上肯定是极其成问题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做法最初是极富成效的。以打上了社会学烙印的历次大规模讨论为例 从孔德、迪尔凯姆、齐美尔直至马克斯·韦伯 所有概念均源于欧洲的经验领域，源于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欧洲的普遍性经验。

同时 这些概念掩盖了“西方理性主义”(“马克斯·韦伯语”中的概念至上论。同样 对殖民地的剥削与压迫也曾经影响过、目前仍在影响着形成中的欧洲民族意识 而人们对它的意义也讳莫如深。这段上百年的屈辱至今都在毒害着所谓的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极其必要的对话。对于许多欧洲以外的经验领域来说，“全球化”只不过在美化某种新形式的剥削与帝国主义，即世界市场的专制。

威 回过头来看是这样的 但这不可归咎于这些事情的始作俑者。

贝 的确如此。就经典学者的经验领域来说 其特点在于 在我们做回顾时呈现为描述性概念的东西 对于当时许多同时代的人来说却是规范性的。

人们必须想象一下 社会学家 尤其是社会学的经典作家 实质上对某种并不存在的未来作出了表述 并起草了表述的体系。他们以有别于当时各种理论框架条件、

经验、讨论的方式 给形成中的市场社会与工业的活力加上了概念形式，这些概念形式随后传遍了全世界。且不谈论它们的政治后果，对于经验性研究而言它们就是很有意义的。我必须明确指出：从自己的社会推论出社会之一般，这种对普遍性的错误推论构成了社会学的出发点 同时它是社会学取得最初成果的秘密之所在 而这是明确无误的。这样一来，经典作家就推动了社会学。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经验的 sociology 表述不再同西方社会学对社会“集装箱”的理解协调一致 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已很成问题了。如果要对此加以概念界定的话，可以在整体主义与全球性之间作个区分。整体主义指从某个社会推论出社会之一般 与此相反 全球性表述了这样一种经验，当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学家根据普遍的概念对自己的社会作出分析 作出彼此矛盾的阐释时 才会形成这种经验。这样一来，再没有哪种特殊的观点可以作为出发点来研究社会，便一下子变得明明白白的了。一种全球性的或者说世界政治性的 sociology 必须彻底地转变眼光 开辟一片对话式的思想与研究的全新空间 相应地重新思考、重新营造自己的概念与结构 而且要远离以民族、民族国家作为自己思想和研究领域的统一性原则这一做法，也要远离北大西洋这片空间（正是在这片空间中 通常有关未来的传奇才表现为“试管”中的首要之物）走向一种全球性的社会整体，在这一整体中赋予所谓边缘地区的后殖民主义以重要意义。这也有助于在方法论上理解所谓中心地区权力集中这一情况。也许，中心地

区的社会学家与社会理论家确实由于切近的原因而对权力熟视无睹，需要由与屈辱抗争的其他人员洞悉权力的视角来作出修正 而这样做也不是为了后者 而是为了把握前者自身的境遇与角色。这种世界政治视角的转变给社会科学带来的革命性结果，近似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给牛顿物理学带来的结果。

威 如今 这些概念已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不妨在广泛的意义上对此作一些深入的讨论。我想再次谈谈第一个阶段，即社会学的经典作家们。他们之所以成为经典作家，是否是因为他们那种预测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所有其他的人都哑口无言了？

贝 我们那些社会学‘教皇们’的富有戏剧性之处在于 他们的那些‘圣经’始终还在起作用 始终还未像其他学科那样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在社会学中并没有像自然科学中那样的某种或多种理论构想，来给这门学科下个定义。经典作家就是理论替代物，因而他们看起来是无可替代的。在人们接受社会学（尤其是德国的社会学）时 经典作家迄今都具备的这种意义、这种作用 使得人们难以认识到他们在上百年前、一百五十年前 即近代初期 形成的、归纳入范畴的各种经验所带有的局限性。困难之处还在于 他们是些极其重要的思想家 懂得锤炼必不可少的思想内容。这些范畴的创造者（马克斯·韦伯是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迄今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掌握着各种思想轨迹的体系，这些体系创造出了思维之

路。社会学迄今都是在这些道路上运行的。

威 对于像我这样的外行来说 这有些神学悖论的怪味道 我依靠的是信仰的真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这些真理是在特定的行动条件下阐发并抽象出来的，但我总离不开这些真理，总要将它们套用到变化极大的情况中去。教父们与神甫们不曾被杀死。然而 社会学的对象是民族国家 教父们当然就是在民族国家中生活、活动、思考、研究理论的 而这个民族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变得脆弱了。今天 人们在许多地方都可看到 民族国家再不具有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所具有的那种意义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代，必须用新的范畴来衡量这个新时代。鉴于形势变化了，社会学难道不该呈现出全新的面目吗？

贝：这就是关键问题，它指明了我全部判断的核心。我相信 回答了这个问题 就可揭示紧张关系、不安、仇视心态，以及在社会中乃至在社会学中可感受到的思想觉醒。实际上 按我的假设 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变化 它改变了社会学历史形态中的对象、主体。对这种基础的变化可从推动了第一次现代化的动因方面来理解。但许多同事对这种解释的反应是惊慌失措的，因为他们感到，这样一种假设敲响了社会学的丧钟。我注意到了与此相反的情况。在当今各所大学都固定地开设社会学之际，在社会学拥有充足的研究力量之际，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生都接受了社会学教育、接受了与社会学相关的思想

体系之际 社会学却突然遇到了这样一种状况 即整个社会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境况，它使得社会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社会学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要进行重新探讨、确定、处理和回答 而且不是在无所不包的乌托邦理论中、不是在为琐琐碎碎的民族主义辩解这一意义上探讨，而是在跨民族的文化比较中探讨的。人们必须鼓起勇气，重新提出或许大家都已经回答过的重大的问题。借助于社会学在这期间获得的高度专业性 应当能做到这一点 同时吸引住所有涉猎社会学的人们。

威 你谈的是一场危机，一场社会学的概念危机与基础危机 并把这当作社会学革新的由来。另外 马克斯·韦伯说过 在某个时候 看待重大价值问题的眼光会发生转变，那时，各门科学都必须更进一步修改它们的概念。这是什么意思？这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贝 对此 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方面 是人们首先要意识到 目前发生动摇的是哪些基本的思想 第二个方面 是如何从社会学角度处理这些问题 为什么这不是社会学革新的归宿，而是它的出发点？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对我们迄今的诊断作出的主要的方法论结论是 社会学植根于民族国家 并在此视域中阐发出自身的理解、自身的认识形式、自身的概念 如今它在方法论上已带上这样一种嫌疑，即在使用僵死的范畴。僵死的范畴是无生命力的范畴，它在我们的头脑

中作祟，阻碍我们认识现实，使得现实越发离我们而去。就连用僵死范畴加工而成的精致经验，也成了盲目的经验。僵死的范畴源出于 19 世纪的经验领域 即我所说的第一次现代化，由于它以分析先验论的方式控制着经验，就使得人们看不到第二次现代化的经验与活力。

威 这是一番宏论 必须演绎出来。它的结论是什么呢 如何具体解读它呢？

贝 首先 社会学要作自我批评 经受质疑 即它的基本范畴在何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假设之上的，而这些假设在历史上已然过时了。接下来应当作这样的尝试：根据历史阐发新的范畴、新的对立观点、新的理论框架 即开拓出一片有关社会、社会学、政治的思想空间 使得人们可以用各种色彩、经验、生活来充实与其相关的理论框架。也许我们不妨谈得再具体一些，就一个问题来谈。

要知道，家庭是社会学分析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单位，因而也是它的关键范畴。例如 借助于对家庭的剖析 可以对各个阶级下个定义。因为家庭收入大多是根据男性有收入者确定的，它显示着所有家庭成员的阶级属性。在今天 何为家庭 这个简单的问题会令土生土长的西方居民茫然不解 就像这样一个问题一样 社民党是干什么的 透过家庭这个微观世界 人们可以细致入微地观察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根本无需做社会学家。家庭里面什么都有 我的孩子、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 离婚、再婚、分居 各种职业经历、居无定所、第二

个住址等等。而且还有祖父母！祖父母不仅愈来愈重要，以便作为后备军来克服日常的纷杂喧嚣，而且由于子女的离婚和再婚，他们即使自己无需做什么也变得数量愈来愈多了——并且完全无需基因技术有什么作为！

在这种纯属正常的爱的迷乱中，社会学应当来解答那看起来如此简单、对阶级分析来说又不可或缺的棘手问题：何为家庭？回答是：占据我们生活的核心位置的，是一度在分析时被合起来设想的东西，即家庭在空间上的家庭单位、社会意义上的家庭单位、经济意义上的家庭单位。但家庭已不再像社会学一度理所当然地、迄今也为阶级分析方法所设想的那样，是合在一起的了。那么，我们是如何发现这一点的呢？这也是很有趣的。可是由于我们将最新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而不仅是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原来所设想的社会各阶级的基本单位。这种反思性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将社会学应用于社会学，它可使依靠僵死概念进行的批判变得富有成果。这样，有一点就变得清晰可见了：阶级分析以正常家庭为前提条件，但正常家庭已经不复存在了。

威：现在我慢慢地理解您的同事了。因为这样一来，社会学及其完美无缺之处的确就不复存在了，不是吗？

贝：社会学的确丧失了它初始时期的那种自明性。既然人们已不能界定家庭，那么该如何着手呢？法国社会学家让-克劳德·考夫曼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他面对的问题是，如果一对夫妇再不能凭结婚证和性来得到界

定 那么什么是夫妇呢 他的回答是 如果两个人购置了一台洗衣机，而无需购置第二台，那么这就是一对夫妇。因为这样便开始了日常纠葛、商量、推托、说服这些故事，这就是考夫曼在《脏衣服》（他的著作的标题）中所讲到的 什么叫脏 什么人在何时为什么人洗衣服 有必要熨衣服吗 要是他说有必要 而她说没必要 会怎么样？一切都可以商量 而且也必须经过商量 因为引申出答案的规矩是不明确的，或者说是并未直接得到认可的。但这些问题不会当真得到讨论，这仅仅是因为它们是个讨厌的问题。另外，因为共同生活恰恰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不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问个没完没了，提问的人都应当自觉地适可而止。问题的难点还在于，在脏衣服这件事上 问题根本不在于脏衣服 而在于一个人是否接受或轻视另一个人，以致于争取对方承认与接受自己的身份 于是日常的冲突就会爆发出来。用一句常话来说 你不给我洗衣服 就是说你瞧不起我这个人 这就是说 社会学要审视僵死范畴背后的东西，必须重新发现社会学要做的事情。现在 人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弄清楚 在我们惯常重视的自我描述背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陌生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如何不断自我更新的？

威 僵死的范畴——这真是个讨厌的词 所以我想再次插话 什么是僵死的范畴 我何以识别僵死的范畴？

贝：这当然一点儿也不容易。在这方面毕竟也没有试纸。但是 可以稍微系统一些地说 旧的概念建立在三

条原则之上，而这三条原则在今天已很成问题了。

第一条原则是我们已经讲到的社会学的地域局限性 即社会学的观念及其概念都植根于民族国家这个“集装箱”之中。这里所讲的观念是 社会行为需要附着于地域上，地域上的远近造成了社会关系的远近。但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遇到这样的情况：离得较近的人们有可能是彼此隔离的，而离得较远的人们可能关系很密切。社会学的概念必须接受这一基本思想。几乎全部社会学与政治理论都有一种地域上的偏见。在一个交往网络化的世界中 数字是主导一切的。有鉴于此 人们必须重新思考社会学的基础。而在这个世界中，社会性界限虽然不依赖地域性界限，但是正在重新划分和确定。

第二条原则是服从某种既定的社会集体性。个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他置身其中的环境决定的。个人是无法选择环境的。家庭的概念、阶级的概念乃至民族的概念等等都是这样设想出来的。这对社会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因此社会学便有理由对个人行为进行抽象，并有可能对个人的自我意识作出意识形态上的怀疑，因为集体环境这一事实在那里未得到恰当的表现。与此相应 社会学就要将个体化的新形式（以后我们肯定还要谈到这一点）放到突出的位置上来。

第三条原则似乎就是进化的原则。这就是说，我们今天立足于西方 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功能上的成就，一种较高程度的社会化，一种高于其他社会化形式的独特之处。持有这样一种进化上的偏见，社会学便既不能作

思考 也不能组织 因为取代有限的进步乐观主义的 是一种随意性 就是说发展是无法预见的、无法控制的和不确定的。这样一来，就难以确定这种现代化的方式是否会因为它带来的阴暗面而受到质疑，以致于关于正面的收益、成就的想法也会因此而消失殆尽。由于分化与个体化的进程 关于某种众所周知的、既定的集体环境的想法也会烟消云散。个人变得孤立 他们要进行选举 组建自己的集体性，并意识这一集体性。集体环境随之也会越发依赖个人的自我界定。

威 这种发展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是彼此不同的 并以彼此不同的方式得到了表述。人们讲后现代，讲第二次现代化，指的就是这种发展的概念。但第二次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意味着 我们告别了第一次现代化 步入了一片全新的领域，而我们对这片领域还一无所知？

贝 是的 讨论变得毫无头绪 就像社会的发展一样毫无头绪。在 80 年代，后现代理论家，尤其是法国哲学家 纷纷登场 宣称要告别启蒙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宏观叙事” 挑衅性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代还有“宏观叙事”吗 我们能否继续推行现代化所带来的思想力量、乐观主义、设想、方案与政治？

现代化论者自己说 这是可能的 毫无困难 因为现代化本来就表现为它自身的危机，本身就是对这种危机的反思。他们说 后现代提出的批评 是对现代化所做的过于简单的描述 仅仅把现代化理解为一连串的危机 以

及通过进一步的现代化不断克服这些危机的可能性。而问题往往在于 各种矛盾、冲突纷纷显露出来 使得现代化的进程本身成了问题 以致于我们再无新的出路 即后现代已然是现代世界的兴起，而现代化终究也是自身的后现代化。

这些论据也被用来反对第二次现代化的理论。经常有人说，那些声称已步入第二次现代化的人对现代化的描述过于简单，以为现代化的特点就在于它会克服自身的基础。事实上 现代化的批评者 即从尼采到德里达这些怀疑现代化福音的异教徒，不断提出新的现代化思想，而这种新的思想正是现代化的庞然大胃已经嚼烂而又吐出来的东西。如果人们要针锋相对地贯彻第二次现代化的理论，就必须掌握出色而充分的论据。

威：第二次现代化的理论是如何阐发出来的？

贝 首先 人们必须明确 在下面这个问题上 后现代主义无法为我们提供帮助。这个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分析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主义远离科学，无助于我们阐发出新的概念。与此相反 它恰恰阻碍了进行自我更新、创造相关理论框架、范畴及相应机制这些科学尝试 使得人们无法理解，也无法从政治上驾驭社会变化。

此外，“后”这个词是知识分子的拐杖。他们只是讲述“情况”不会“是什么样子，而不说“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生活在“后”论、彼岸论的时代。一切都是“后”彼岸也是“后”。这是一知半解的做法，它只是确定 我们不能再

使用旧的概念了。这里既隐藏着学术上的懒惰，也有一些学术上的不诚实、不正派，而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阐发出概念。借助于概念，才可重新界定和组织社会与政治。

我的第二次现代化理论不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很成问题的历史分期说，就好像第一次现代化持续到70年代，此后就有了第二次现代化，凡第一次现代化中所形成的东西都沉沦下去了。我们从此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需要有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释现实。仅就称谓而言，区分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的前提是有“现代化”，有某种共同的“现代性”。对这种共同性，必须在跨国的层面上确定、把握、推论和思考，它既要考虑到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冲突，也要考虑到亚洲、非洲、北大西洋地区等各自的现代化经验与方案。这就意味着，要在延续与断裂之间作出区分。有些特定因素决定了延续性（例如，发展之路、人权、公民权的意义，民主的价值与前提）相反，另外一些因素则带来了彻底的变化（例如，方法论意义上的国家民族主义，西方在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优势，而这种优势要靠“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来得以克服）。

在我看来，要在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之间作出区分，关键在于那些僵死的范畴已僵死到了极点，另外，相应地还出现了僵死的机制。至关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强制性，即为社会学发明出新的概念框架，或给旧的概念框架作出全新的解释，充实以全新的内容。将社会学